

新中華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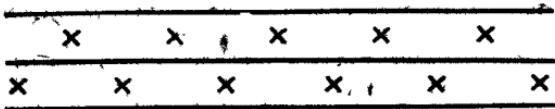
文藝彙刊

文學論文集(二)

張夢麟等著

行印局書中華上





文 學 論 文 集 (二)

新中華叢書
文藝叢刊之一

張夢麟等著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序

這是本叢書中的第二卷文學論文集，共收文字五篇，第一篇說整個歐洲的現代文學，第二篇述美國的文學現象，第三篇說近代文學中所涉及的一種社會問題；第四、五兩篇則係兩位文學家的研究與介紹。

在雜誌上所發表的文學論文，當然不止這些，其中有些不便重印的東西，我們都沒有收入這集子裏。

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編者

華胥社文藝論集

一冊 一元五角

這是現在幾位著名文藝作家徐志摩、劉海粟、梁宗岱、蕭石君諸先生的作品，關於文學藝術的現代思潮，描繪無遺。內容凡十六篇，都十餘萬言，留意現代文藝者，不可不讀。

中華書局發行

中國文學概論

陳懷著

一冊 二角半

本書為一簡短之小冊，計分敍論、文才、文學、文識、文德、文時、總論九章，內容將中國文學之祕奧，宣洩無遺，多發前人所未嘗詳論之佳構。

允推中國文學批評之佳構。

文學論文集(二)目次

序

現代歐洲文學的趨勢(張夢麟)	(一)
美國文學的現代性(楊維銓)	(一七)
近代戲曲與離婚問題(張夢麟)	(三五)
蕭伯納的劇及思想(張夢麟)	(五二)
近代中國民族詩人黃公度(葛賢寧)	(七)

文學論文集(二)

現代歐洲文學的趨勢

張夢麟

一

一國的政治和經濟常反映出其國民當時的狀況，同樣，一國的文學藝術，也表現出這一國的國民的生活。所以近世研究文學的學者，都一致認為文學是時代的表現，是社會的反映。最近，法國最有名的雜誌 *Le Crapillon*，會向法國的三個有名小說家，請他們在近代法國的文學藝術裏，尋出一個近代法蘭西的正當的解釋。這不外即是證明文學與時代社會，有極密切的關係。而同時德國的希特勒首相，焚毀書籍的那驚人的事實，也只是在表現焚毀書籍中所反映的一些德國國民的生活，是希特勒的治下所不願發表的吧了。

從歷史上來看，藝術至上主義 (*Art for Art's sake*) 的文學，便反映了當時安定平穩的生活，而人生派 (*Art For Life's sake*) 作品，便描畫出革命中的動搖社會。同樣，笛卡爾、拉辛、莫里哀

等，代表出路易十四時代的安穩的法蘭西，而盧梭、福爾特爾等輩，即代表法國大革命行將發生的動搖時代。美國方面南北戰爭前那種不安的時候，即在惠提爾(Whittier)、愛謀森(Emerson)、羅威爾(Lowell)反抗使用黑奴的文中看出，及至戰爭已過到了太平安定的時候，反映這個黃金時代的東西，便只是馬克吐溫(Mark Twain)的諷刺小說而已。

文學只是反映時代社會的東西呢，或者乃是變化社會的原動力？這個，在這裏我們暫時不去管他。迭根斯的小說，如實地表現出十九世紀的英國，沒有那樣時代和社會，也許就沒有那樣的作品，這可以說是一個事實。可是，因為有了那樣的作品，十九世紀的英國的社會，才會有許多的改善，這也是同樣是真實的。總之一國的文學是和它的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聯，而且當這個社會是在變革的過程中時，這個關聯，更成為非常的重要。因為這種時候的社會生活，只有在文學作品裏才能最明顯地表現出來。歷史上的事實，且不必談，現在歐洲幾個大國的文學和它們社會生活的關係，便是一大明證。歐洲這幾個強國，現在正處在一大變革的前夜，它們眼前的將來，誰也不能知道，誰也不能確定。可是這種動搖不安的狀態，已在它們的文學作品中，明明告訴我們了。現在，我們就基於這個觀點上，來看看現代歐洲的文學趨勢，是個什麼樣子。我們在這裏例

舉出來的東西，暫以德、英、法三國的爲限。

二

德國自希特勒柄政以後，便做了幾樁德國文化史上，值得特筆大書的事，如沒收愛因斯坦教授的財產，焚毀一百多種書籍等等。德政府對於愛因斯坦的這種舉動，在世界上稍爲有智識的人看來，都是十分驚詫，認爲是極滑稽荒謬的事。可是從希特勒的政策看來，縱令是極不近人情的舉動，也自有他的意義。那麼，焚去了一百四十九種德人作家的書籍，當然更有重大的意義，而發現這個意義的所在，更是極必要的工作了。

現在，我們就從這焚毀的書籍中，舉出幾個顯著的文學的作品，以見希氏不想使德國一般人民感受的新傾向。在這些作品中，第一，應該首先推舉的，便是雷馬克 (Remarque) 的兩部作品：讀過西線無戰事的人們，當知道雷馬克是一個非戰論者。他的作品，都是反對戰爭，提倡和平的東西。從他作品銷行很廣的這一點看來，可知一般人的傾向，是偏向着他的這個主張了。

其次，便是羅斯 (Joseph Roth) 的工作 (Job)。這書中國雖沒有聽見說過，可是在德國及其他歐美各國都是銷行很廣的小說。這裏面所表現的傾向，便是戰後德人對於猶太人的親善，

作者一半是在鼓勵這個傾向，一半也描寫的是實情，可是却遭了希特勒氏的禁止了。還有一部作品，是福熙萬格爾氏(Feuchtwanger)的成功(Success)，這部作品，也是歐洲各國很賣得的小說，內容是嘲笑希特勒個人。——從今年三月五日的總選舉看來，希特勒佔了絕大多數的勝利，他這篇小說，固然沒有表現出一般德人的傾向，可是由這部小說的風行看來，也可知希特勒氏的人望，並非舉國一致的。

蔡格氏(Arnold Zweig)的伍長格里沙(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)也在被焚毀之列。這一部書的內容，不惟是在諷刺軍閥政治，而且就如羅斯之鼓勵親善猶太人一樣，也在鼓勵對於本國以外的外國人，要十分的和藹。尤其是觸希特勒政府之忌的，恐怕是作者故意擡高一區區伍長的聲價，而把將軍長官們不放在眼睛裏這一點了。

至於如像雷恩(Ludwig Rein)，格萊塞爾(Ernest Glaeser)等作家的作品之被焚毀，理由自然更是明顯。因為這幾個作家，都是同情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作家。可是他們的作品，並不很銷行，又從希特勒選舉得勝這兩點看來，可知共產主義之在德國，勢力並不很大。不過，德國現在的社會，並不是完全沒有共產主義的侵入，但是雷恩氏和格萊塞爾氏的作品，却不能

拿來做代表。因為他們最初的得名和現在的人望，全是由戰爭(War)——九〇二年級(Class of 1902)兩部戰爭小說而起。這兩部小說，都不是共產主義的作品。現在德國的社會主義作家，當以亨利曼(Heinrich Mann)為代表。

可是，戰後德國社會的傾向，表現得明確，而為希特勒政府所最欲壓迫的，還不是亨利曼，而是他的兄弟脫馬斯曼(Thomas Mann)。

一九一四年歐戰勃發的時候，脫馬斯曼所處的地位，剛好和他社會主義的兄弟相反，他會隨着當時的智識階級，簽名贊成德皇的宣戰。換句話說，即是他當時是一個愛國主義的作家。可是到了戰後，他的思想漸漸地變換起來，以前的愛國主義者，現在却極力鼓吹德法的親善，常常遊歷巴黎，到處講演德法兩國的共存共榮。過後更作了魔嶺(The Magic Mountain)，一捨以前那種褊狹的國家主義的立場，而以全歐為背景。因此，在一九二九年得了諾貝爾的文學獎金。

一九三〇年的脫馬斯曼，思想又更進一步。他曾在國際實業家總會(International Rotary Club)講演，說到近代歐洲的作家是站在兩火之間，即是右邊是法西斯主義，左邊是社會主義……他若果要選擇的話便是走入反法西斯主義的這一面去。所以這回希特勒氏的選舉，他便

盡力地勸國民不投希特勒的票。結果雖然失敗，可是今後唯一和希特勒政府相爭鬪的，便是脫馬斯曼所代表的德國現代的文學了。

三

假使現在的英國，也像德意志一樣，產生了一個希特勒，組織了一個獨裁的 Nazi 政府，也來焚毀書籍。那麼，在文學方面，他就要焚毀，也沒有什麼作品可以供他焚毀。因為產生希特勒的這種獨裁政治的德國社會，也就是產生這些被焚書籍的德國社會。戰後的十四年中，德人的生活弄得非常緊張，社會刻刻在遭遇變化，這種不安動搖的狀況，便呈現在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學裏。和這樣不安定的社會相比較起來，英國人的生活，實在太平穩了，所以不會有那樣獨裁的政治，又那裏會有反映這種世象的文學呢？現代的英國文學，便是一個表現出安定的社會的文學。

英國戰前的文壇巨擘，所謂「四巨頭」的蕭伯納、威爾斯、高爾士華綏、柏涅德（Arnold Bennett），到了戰後，已成為過去的老大家，一九二〇年以後，更有許多中堅作家，起而代替他們的位置了。其中如洛倫斯（D. H. Lawrence）、喬治（W. L. George）、馬肯志（C. Mackenzie）、斯文納登（F. Swinerton）、甘南（G. Gunnan）、華爾坡爾（H. Walpole）莫汗（S. Maugham）等，都是具

有他們前輩的特質，還加上一層對於新時代的理解。作品方面，也產生了許多名作，如兒子與愛人（*Sons and Lovers*）、富家子（*A Bed of Roses*）、不幸之街（*Sinister Street*）、轉角（*Round the Corner*）、吉烈米（*Jeremy*）、人情的束縛（*Of Human Bondage*）等都是。但是在這裏面，只有洛倫斯一人，算是不負一般的期待，成為代表英國文學的作者。然而他也和喬治一樣，已經是死了的人了。甘南困於病魔，杳無貢獻，斯文納登的作品，越來越難讀，越來越沒有人讀了。僅僅只有馬肯志的不幸之街和莫汗的人情的束縛是他們代表的傑作。可是這七個作家，在初起的時候，都是極有希望的作者，他們並不是沒有觀察新世界的能力，並不是沒有表現新世界的技巧，可是新的世界新的社會，在英國始終沒有出現，所以他們的天才，也就只好墜地了。

但是在這些中堅的作家中，却有一個例外，那便是洛倫斯。洛倫斯的作品，可以代表英國今日文學的一面，正如脫馬斯曼之代表戰後德國文學一樣，洛倫斯作品中所現的趨勢，有兩點值得我們的注意。我們要記着這位作家，是出身於英國的勞動階級，可是自從發表了兒子與愛人以後，他便對於他出身的階級，絕口不談了。這並不是他看上了以外的任何階級，他之痛恨其他階級，更甚於他自己出身的地方，可是他主要着眼點，已在戀愛之中，去求個人的救濟去了。這個

事實即是洛倫斯之出現於英國文壇，乃是表現英國的勞動階級，對於英國的文化，猶有貢獻，可是洛倫斯作風的轉向，也就表示出勞動階級要對英國文化有所貢獻，現在尙非其時。又從洛倫斯作品中的人物看來，使我們知道英國的社會狀況，還沒有如像德國那樣的成熟可以有這樣的作者和作品出現，所以終洛倫斯之身，既沒有像德國那些作家那樣活躍，也沒有像他們那一種的作品出現了。

英國中堅作家的成績，不過如此，那麼一九二〇年後的新進作家，又怎樣呢？在這許多新進之中，最特色的恐怕要算赫胥黎（Aldous Huxley），而他的傑作曲線戀愛（Point Counter Point）怕是近十年英國的作品中，最能够在英文學史上佔最久的位置的了。

赫胥黎氏在這篇作品裏，所表現出來的銳敏的感受性、幽默、以及厭世觀，使他在批評者間，受到很高的推崇，可是這篇小說最有價值的地方，還是因為它可以拿來當成一個英國社會生活的實錄看。在這篇作品裏，便寫出了洛倫斯極想逃避的英國社會那種偽善、停滯、妥協、空洞、和頹廢。洛倫斯的作品，努力在叫英國人變換他們生活的方式，叫他們在「愛」裏去救渡自己。赫胥黎便把他周圍的實生活，詳細周密地記錄起來。其餘的作家，便實際在逃避現實了。其中如尼

柯爾森 (Harold Nicolson)、史倫 (Michael Arlen)、陶格拉斯 (N. Douglas)、杜萊美 (W. De La Mare)、嘉涅特 (D. Garnett)、伍爾夫女史 (Virginia Woolf) 等都是名盛一時的現代英國作家，他們的作風，雖是各有不同，可是同是在逃避。

現代的英國文學，雖然對於社會問題，無所貢獻，可是在另一方面，却較其他各國，更為活躍。自從女皇維多麗亞歿後，英國女性的才能，日益發展，到得今日，單是在文學方面，女作家人才輩出，已足够使一般男子文士瞠乎其後了。我們試一舉現代負盛名的女作家羣，便有伍爾夫女史、麥高雷女史 (Rose Macaulay)、湯朴森女史 (Syrlia Thompson)、辛克萊女史 (May Sinclair)、雷曼女史 (Rosamond Lehmann)、史達恩女史 (G. B. Stern)、威斯特女史 (V. Sachville West)、鄧女史 (Clemence Dane)、彭森女史 (Stella Benson)、史密斯女史 (Sheila Kaye-Smith)、金涅底女史 (Margaret Kennedy)、威斯特女史 (Rebecca West)、席維爾女史 (Edith Sitwell)、詹姆森女史 (Storm Jameson)、李却森女史 (H. H. Richardson)、與已故的曼殊斐兒女史 (K. Mansfield) 和威爾孫女史 (Romer Wilson)——一共有十七位。這十幾個女作家，講到她們的成就，她們所給與的影響，她們作品的銷行，在現在英國男作家之中，除開洛倫斯和赫胥黎而外，

我們能數得出十七個，足以和她們抗衡的麼？單是這個事實，已足以反映出英國的社會，當日蕭伯納批評玩偶家庭的預言，現在已在英國文壇上實現了。

一言以蔽之，在比較安定的英國社會裏，所反映出來的文學，大致是在向着藝術至上主義這一個方向走。詞藻的練磨，技巧的角逐，新古典主義的追求，凡此種種，都表現出一個太平無事的世象。

可是，風靡了全世界的蘇俄五年計畫的成功，也不能不在英國文壇上，留下一些痕跡。現在英國最負盛名的批評家愛里奧特 (T. S. Eliot) 所主辦的雜誌 Criterion，政治上是保皇思想，宗教上是英國加特律教，文學上是傳統的古典主義，十載以來，巍然獨立地代表了英國文壇，可是最近却遇着對手，表現出動搖不安的狀態來了。它的這個對手，便是穆勒氏 (J. M. Murry) 所主辦的雜誌 Adelphi。穆勒氏所提倡的是文學的社會主義。在那沒有社會背景的英國，Adelphi也時露出偏促不安的脾氣，可是我們可以知道爭鬪已經開始了。

英國文壇這種傳統的，古典的趨勢，致使批評家們認它為缺乏世界的精神。包散蒙氏 (Poul Colew Pothain)，在 Living age 誌上論今日的英國小說時，說道：

「近代的英國精神是世界的，可是現代的英國人都意識地自己是英國人而排斥外國來的影響了。保護關稅、帝國合作、國民政府等，便是今日英國的趨勢，這條路到底要走到什麼地方去，誰也不知道，可是我們已感覺到快要發生轉變了，這種轉變，在文學裏也感得到……」

包散蒙氏之所謂的轉變，大概即是指 Criterion 誌與 Adelphi 誌的鬭爭吧。

四

現在我們講到法國的文學來了。戰後法國的時代精神，正是包散蒙氏所說的「世界的，而且較之近代英國，更為顯著，更為真摯。名作家莫蘭氏（Paul Morand）便是這個精神的首創者，也是這個精神的模範。他一個人能說幾國的言語，遊遍了許多國家，順應了許多環境——這還不是一個十足的「世界的」的人麼？我們現在試來看他一九三〇年前著作的述懷，他說：

「大戰停後，便開始了一種奇怪而驚人的生活，這個生活一直繼續到一九二五年左右。這種生活，是一種不可再見的東西，因而我就想把這個有興味的時代，把它的歷史記錄下來，把它的圖樣，描畫下來。結果，便出現了 *Ouvert la nuit* 和 *Ferme la nuit* 這兩部作品。我個人是不知不覺地而且事與願違地成了一個小說家。因此我也就和我的外交官生活告別了。

——我是永遠成不了一個好外交家的，不然我也一直做下去了……又從一九二五到一九三〇年，我曾試作一部二十世紀的年代記。結果便產生了 *La Vie Parisienne*, *Lampes à arc*, *Bonduha vivant*, *Magie noire*, *Champions du Monde* 等作品。當我在美國收集末後這幾本書的材料時，我又出了一部 *New York*……」

可是隔了三年之後，莫蘭在菲、亞、南、北美洲去收集材料的二十世紀，——即是具有世界的精神的二十世紀，已經變成國家主義的二十世紀，我們的小說家，又只好去做他「永不會成一個好外交官」的職業去了。

但是，在一九二〇年前後，把法國的文學，造成一個含有世界精神的文學的人，決不僅是莫蘭一人。第一戰後不久，得到龔古爾文學獎金的人，便是一個北菲洲的黑人作家。次一屆的獎金，歸入范康尼耶 (*Aenri Fanconier*) 之手，但是以作關於 *Malaysia* 的著書而得的。又次一屆的獎金，是柏德爾 (*Maurice Bedel*) 因作 *The Latitude love* 而得，而這部書，也是描寫法國以外——北歐腦威的小說。又羅加氏 (*Thomas Rautat*) 最成功小說 *The honorable Picnic*，是以日本為背景。德哥派拉 (*Dekobra*) 的小說 *The Madonna of the sleeping car*，與夫其他無